

一个必须正视的重大认识误区

——为“创新”和“企业家”正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Nominal Rectification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in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程 序

(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 北京 100094)

20 世纪中期以来, 在中国的报刊、文件及多种场合, “创新”二字骤然间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这种现象固然反映了国人对通过科学和技术加快发展经济的巨大热情, 但是现时流行着的种种对创新的随心所欲的理解, 以及各种由“创新”两字组合的新词组, 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误导和误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不但会产生庸俗化, 更危险的是, 大家会因满足于一些人云亦云的解释, 以致结果必然是阻碍实现真正的创新, 也将会不利于我们现在最缺少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产生。为此, 非常有必要对“创新”和“企业家”的原意和内涵进行考证和探究, 以正本清源, 让正确的理论对社会实践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一、“创新”一词的原意

“创新”概念的首创者——J. A. 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 是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负有盛名, 自其去世后至今, “国际熊彼特经济研究会”一直未中断过活动。1912 年, 熊彼特在他发表的划时代巨著《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中首次提出了“创新”(Innovation) 理论, 并对“企业家”(Entrepreneur) 下了特定的定义。其内涵主要有以下 4 点。

1. 惟有“创新”才能够打破“静止均衡经济”的“零利率”, 产生“正利率”。

熊彼特认为, 经济都有演进到静止均衡态的趋势。当经济达到静止均衡态后, 利率就将降为零。而唯有企业家实施“创新”之后, 才能打破这种均衡, 使利率变成正值。经济学家 H. Giersch 指出, 战后西德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勃兴, 其主要支撑条件是大批“创新”活动爆发性地产生。而其关键正在于西德拥有了很多符合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这批精英人才

大部分系来自东德、捷克和波兰的难民, 还有原德国军人政府中的某些官员; 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战前受过“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系指组织、领导能力, 和按自己的灵感动手制作方面的才干) 的训练。

2. 创新是企业家使用他人的发明、专利, 实现首次商品化的开创性过程。其使命是实现 5 个成分的“新组合”。

熊彼特指出, 企业家并不拥有, 也不经营、组织、推广某项发明成果, 亦不承担引入这类发明成果的风险。他的独特使命只是实现一种组合过程, 即把某种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引入某种新生产组织形式中, 据此影响经济消费的数量和结构, 即开辟某种新市场, 并且为了确保这种新的生产而开拓新的原料供应渠道。这个首次实现发明或科学技术成果的商品化的全过程就是创新。

3. 只有“企业家”才能够引发“创新”; 企业家的唯一使命也是实施创新。企业家须具有特殊的素质。没有风险投资者(银行家)的支持, 创新也不能完成。

熊彼特认为, 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动机首先在于他梦想发现并欲征服一个属于他自己思维的领域。为此, 他富于想象力, 有为之奋斗和获得成功的激情。他总想通过创新来证明自己的不凡; 他首先是为了实现其人生的价值, 而并非仅仅为了从创新的成果中渔利。因此可以说, 他喜欢陶醉于以自己的精力和才干进行的创造性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是帅才 (Leadership), 具有开创力 (Improvise ability)。

所以, 熊彼特写道, “创新需要具有超常知识和理想特质的非凡的人。他们还必须果断、机敏、坚忍不拔, 才能完成创新所赋予的任务。”这种人就是企业家。但是企业家的创新要能成功, 还必须要有银行家的支持。因为只有敢于承担风险的银行家才可能为创新提供足够的资金。

4.“创新”同“发明”、“创造”是概念和内涵不同的两回事。

熊彼特以瓦特蒸气机为例,把“创新”同“发明”或“创造”严格地区别开来。他指出,发明或创造不过是实现了某种设施或过程,而只有创新才会向经济注入新的因素。发明或创造只可能是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发明本身具有惰性。一种新发明的设施或机器或一种新的构想问世,并不立即与经济有关系。瓦特 1769 年发明出往复式蒸气机并获专利,但只有当他和布尔顿两人 1783 年开设了一家工厂生产、组装和销售蒸气机,使其成为经济—工业革命的组成部分后,瓦特的发明才完成了创新。

二、笔者亲历的两个案例,可印证熊彼特的创新学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前期,笔者曾分别在北京郊区和河北省沧州地区主持过科技攻关项目,分别探索创建农区高档出口肉牛业和创建盐碱、缺水地区苜蓿草业的途径。虽然最后都取得了成功,但现在看来,如果能够及早运用熊彼特的创新学说作指导,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肉牛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京郊农区是不存在的。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仅有少量外地运入的牛屠宰后,以很低的补贴价定量供应回民;而我们主持的项目是要开发能大量利用秸秆的草食动物(主要是肉牛),如按传统的常规途径则不可能有价格竞争力。形势逼迫我们另辟蹊径,采用逆向思维。先考虑有经济可行性的产品——优质活牛出口及合资饭店用的高档分割部位牛肉,然后再靠自己开拓市场和研发相应的技术、工艺;同时,还要为实施所确定的“牧区繁育架子牛—农区强度育肥”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在内蒙古开拓了稳定的架子牛供应基地,以及建立了集约化的饲养组织方式。最后,产品打入了香港的活牛市场,高档分割部位牛肉也部分替代了一些合资饭店的进口牛肉。到现在,肉牛业已在包括京郊在内的广大平原农区得到很大的发展。

至于沧州地区种植的苜蓿,现已成为这个因严重缺水而调减传统的粮、棉种植业结构地区的理想作物,并已成为当地农村的支柱产业之一。然而在 20 多年前,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初,畜牧行政部门曾仅仅为改良、利用大片盐碱荒地而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苜蓿的飞播,使苜蓿的保有面积一度超过 100 万亩,但由于未解决好苜蓿的利用出路,地方和农民得不到实惠,结果导致放任栽培管理和随意蚕食开荒问题严重,飞播苜蓿项目濒于失败。我们针对这一状况实施的技术路线是着眼于提高苜蓿的经济效益,从所确定的终端产品——优质苜蓿

草捆和奶制品抓起,一方面开拓优质苜蓿出口和销往大城市郊区奶牛场的新市场,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沧州市开创酸奶市场,建立工厂并采用当时属我校一项乳制品科研成果的工艺,以此来确保能全部、及时地收购我们动员农民用秸秆加苜蓿饲养的奶牛所产的奶,并相应建成支持农民饲养奶牛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最终终于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种植和管护好苜蓿的积极性。

这两个案例都说明,尽管培育优质牛肉和种植苜蓿的技术几乎是现成的,但如果没有对 5 个环节的开拓和组合过程,以及加上有财务风险的承担者(在肉牛案例中是发放贷款的银行,在苜蓿案例中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介入),这两种新产业的成功开发也是不可能的。

三、为“创新”正名的必要性

当前,社会上常可见到把“创新”同发明、科研发现乃至“产业化”等混为一谈,随意组合出各种同创新原义不相干或相差甚远的“新”词,如“知识创新”(实际应是“新知识的发现”)、“方法创新”(实际应是“改进或发明新方法”)、“制度创新”、“概念创新”甚至“开发创新”等等,引起了科技界有识之士的忧虑。中科院院士沈珠江最近在“也谈‘创新’”的文章中明确表示,反对“赶时髦”滥用“创新”一词的错误倾向。

滥用“创新”一词的最大危害在于自我陶醉,误认为自己重视了创新;但实际上却是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追求所谓的“新”上,而不知道只有真正按熊彼特创新学说的主旨和实质内涵为指导,扎扎实实地去开拓每一个环节(尽管这种开拓工作可能并无很高很新的学术水平),和开创性地实现 5 个环节的组合,才可能解决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这个痼疾,使大量闲置的发明、专利和研究成果真正变成商品。

四、也需要为“企业家”正名

此外,现在的传媒和社会舆论还往往喜欢将一般的“经营者”或“经理人”如厂长、经理(均属 Businessman 的范畴),都笼统地美称为“企业家”,这显然是误导。其后果就是使大家想不到要去了解何为真正的“企业家”;进而导致不会懂得真正的企业家的独特使命和企业家人才极其难得之处。实际上,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企业家应该具有特殊的素质(Entrepreneurship),一般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和一般的“经营者”或“经理人”之间绝不能划等号。这一点,从词源考察上也可得到证明。

据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Far Ea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商务印书馆/远东图书公司, 1991), Entrepreneur 即“企业家”一词, 系由法文 Entreprenant(“有进取心的”, “敢冒险的”)而来。显然, 它同 Businessman 即一般的“经营者”或“经理人”是两种有本质区别的概念。

此外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 即笼统地宣称“企业应成为创新的主体”。其后果之一, 是可能会导致严重地忽视真正的“企业家”对创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而会完全忽视培养、扶植这种中国当前最缺乏的真正的“企业家”的紧迫性。

五、培养能创新的企业家所面临的障碍

显然, 我国当前急需大批能创新的企业家, 才能适应“科教兴国”和发展新兴产业的要求。然而要能够有效地培养出能创新的企业家, 最大的障碍来自传统观念和陈旧的教育方法。中国传统观念历来主张“中庸之道”和谨守祖制, 扼杀了冒险精神和开创精神。这同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比如, 美国人就普遍认为, 植根于民众中的带冒险性的开拓精神, 是使他们国家在到达新大陆后迅速强盛的主要原因。

曾获诺贝尔经济奖的美国经济学家 T. W. 舒尔茨早在 1964 年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明确指出, 发展中国家农业实现现代化, 土地、资金等的缺乏不是最主要的困难, 关键在于要向农民进行特殊的投资, 从而使他们能够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近年来, 国际经济界公认, 人力资本, 即大脑、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已构成成为一个国家最宝贵和最强大的资源(见世界报业大王默多克 2001 年 10 月 13 日在澳大利亚的演讲)。可见, 企业家精神在今天对我们是何等地重要。

(上接第 21 页)

平理工大学或综合性大学, 那么, 其理科的建设标准就应该是世界一流水平的, 即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学科工作条件。

不同发展时期, 大学必须明确自己学科建设的重点, 包括学科发展的领域、具体方向和达到的水平, 这客观上就规定了学科发展所需的条件。大学进行学科管理和建设工作, 实质上就是根据明确的学科发展目标, 合理配置有限资源, 进行重点建设, 尤其是要满足学科发展所需的关键性条件, 为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夯实基础。“现代科学如要发挥最大的效力, 就需要集中智力和资源。如果在分配人才和资金方面对所有院校和课程计划一视同仁, 势必造成人才和资金的分散, 那就无法促进现代科学的进步”; “如果‘最佳科学’——更广义地说, 最杰出的学者——要想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受到保护和支

持, 那就必须把人才和资源加以集中, 并且给较强的专业, 尤其是较强的院校以优惠待遇。”^[1]

最近公布的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使人亦喜亦忧。据报道, 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已从前 10 年的第 3 位跃居第 1 位, 成为最受公众尊敬的人。科学技术日益受到崇尚固然是大好事, 但这里也有个引导正确与否的问题。许多访问过发达国家的有心人, 想必都探问过在那些国家里谁的社会地位最高之类的问题。答案是共同的, 即企业家才是最受公众尊敬的人, 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明星、科学家、教授或医生, 更不是政治家和官员。因为他们认为, 只有企业家才是真正创造社会财富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角色。

此外, 目前国内还严重缺乏有长远眼光的科技风险投资家, 这也是使创新型企业家在我国难以脱颖而出的一个主要原因。

总之,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已成为发达国家民族的灵魂, 这一点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为此, 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地为创新和企业家正名, 这也是有关各方必须正视、必须行动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 [1] 冯薇, 苏雪串. 《发展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 [2] 王润良, 郑晓奇. 略论技术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区别, 科技导报, 2000(10)
- [3] 沈珠江. 也谈“创新”. 科学时报, 2001-9-10
- [4] Joseph A. Schumpeter,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 [5] Helmut Frisch, Schumpeterian Economics, Praeger Publishers, 1981
- [6] Robert Loring Allen, Opening Doors,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Schumpeter, Vol. On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 [7] Theodore W. Schultz,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责任编辑 蔡德诚)

较弱的专业, 尤其是较强的院校以优惠待遇。”^[1]

在大学中, 各个学科发展对办学资源的竞争是必然的。大学学科建设, 需要处理好各种关系, 如追求标志性成果与加强学科基础建设之间的关系, 整体优化与优势先行之间的关系, 发展传统学科、举办新兴学科与加强基础学科之间的关系, 提高办学水平与追求办学效益之间的关系等, 需要进行学科利益的重新调整。因此, 大学学科建设的倾斜政策是必要的。没有重点建设, 就不可能快速集聚学科发展的相对优势。如果抓不住重点, 或者想抓重点而又回避矛盾, 把有限的资源“稀释”到各个学科, 实质上是在降低原有的优势学科的实力。

参考文献

- [1] [美] 伯顿·克拉克. 王承绪等译. 高等教育系统.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 [2] 冯向东. 论并校中的融合. 武汉: 高等教育研究, 2001(2)

(责任编辑 肖庆山)